

# 变革时代农民命运变迁的艺术写真

## ——论《平凡的世界》塑造的四类农民形象

文小灯

(湖南工业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湖南 株洲 412007)

**摘 要:**《平凡的世界》描写了社会变革时期农民的命运变迁。社会制度的变革给农民带来的机遇是平等的,从改革型孙少安、知识型孙少平、保守型孙玉厚与政治家型田福堂、孙玉亭这四大类型的农民命运的变化当中可以看到,追随和推动社会改革的农民能得到丰厚的回报,而那些不积极改变自我,甚至试图阻挡社会前进的农民会被时代所抛弃。

**关键词:**平凡的世界;农民形象;改革型;知识型;保守型;“政治家”型

1975年到1985年是中国当代具有历史意义的10年。从万物不生的浩大劫难到神州大地的欣欣向荣,它横跨了中国当代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平凡的世界》以编年体的方式描写了这10年间中国城乡广阔的社会生活。在《平凡的世界》中我们看到,紧跟社会制度的变化而转变的农民得到社会给他们的机遇,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代表人物有孙少安、孙少平、孙玉厚;也有一部分原来受惠于集体制度的农村干部落后于社会变革,被时代所抛弃,表现最突出的是受“左”倾思想影响的“农民政治家”,代表人物有田福堂、孙玉亭。

### 一 改革型——孙少安

置身农村之中勇于改革的农民,在社会变革的大环境中得到了社会给予的丰厚回报。作品中的孙少安,所表现出来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培育出来的朴实勤劳、坚忍顽强的品质。“他不属于那种安于现状的老式农民,而萌发着对生活对人生的新思考。”<sup>[1]</sup>他身上具有投入改革浪潮,勇于与贫困落后作斗争的新人气质,是生活在农村,献身于农村,勇于改革,勇于创业的“改革家”。以前的孙少安,虽然是个念书的好材料,但是高小毕业以后不得不回家务农,挑起生活的重担,尽管他能忍受艰苦的劳动,精明能干,有远大的志向,但是在那样混乱的年代,也只能在饥饿中挣扎。他18岁当选队长,为使乡亲们过上好日子,发挥变革现实的才能——扩大猪饲料地来提高农民的口粮标准,结果被扣上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大帽子。他受到安徽的启示,率先在自己的生产队建立承包责任制,结果遭到了田福堂以及上级领导的反对,这些都是当时的社会制度所产生的恶果。但孙少安是一位有非凡抱负和创造力的青年农民,只要有机会他就会牢牢地抓住,改革政策一出现,他就第一个勇敢地站起来与社员签订生产

责任合同书,大胆地走“资本主义道路”。为了改变全家的贫穷状况以及农村的单一耕作方式,他办起了红砖厂,砖厂红火了一阵,也使孙少安风光一时,成了人人仰慕的对象。孙少安经济上发达以后,并没有感到幸福,反而引出另一种更大的苦楚:“我怎么有这么难过,日子过不去难过,日子好了还难过”。他想把砖厂办大一些,为村民多做好事,但一位“二把刀”师傅烧坏了砖窑,赔了大把的钱,使他的事业还没有起飞就熄灭了。新的社会环境给了他翻身的空间,让他的脚步更加坚实,更加有力。他终于成功了,真正地发达起来。他引导村民去寻求共同富裕的道路,他受到孙少平的开导兴建双水村小学。过去努力拼搏的少安整天想的是怎样不至于饿死,一直梦想着一家大小吃饱饭,如今却能拿出一大笔钱来为他曾在这里度过艰难生活的村庄投资建校。可以说,无论是物质上还是精神上,贫穷落后的历史已经结束,他已踏入新的人生历程。县里为他出资办教育立的石碑,可以看作是孙少安夫妇的人生命运的纪念碑。孙少安出资新建学校“落成典礼”时的地点正好放在当年他因走“资本主义道路”而被批判的操场上。这个时候他的感受是与众不同的,正如作品中写道:“这里将要举行的不再是批判‘资本主义’的大会,而恰恰是为了表彰一个发家致富的人,为群众做出了贡献。孙少安的这种命运的改变,正如他自己说的,这是‘世事变了’,这里的事就是责任制代替‘公社’制的改革,他认为他之所以‘发达’,不是因为他家的风水好,也不是他个人有多大能耐,而是在社会改革的环境中他抓住机遇,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 二 知识型——孙少平

孙少平是农村知识型农民在社会变化中命运发生变化

收稿日期:2009-03-05

作者简介:文小灯,男,湖南邵阳人,湖南工业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讲师,主要从事大学语文的教学与研究。

的代表。如果说少安是以农村为根基,用勤劳和智慧改变自身命运的青年,那么少平是运用自己的知识,通过正当途径出去闯世界开辟新的生活天地的有志青年。他经历过苦难和贫困的洗礼,又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农村的闭塞落后状况激活了他不安分,不满足的心理,文化知识充当起向外的基础,他的心灵世界有着‘农村系列’和‘农村外系列’的双重角色。”<sup>[1]</sup>他对于当代有相似经历的年轻人来说是个好榜样,他不是个传统的农村青年,而是在新旧交替时代所培育的新人。他那进取求新、拼搏和竞争的意识,扫除一切障碍冲向外部的决心,深刻地反映了农村经济制度改革以后,破土而出的小生产者在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方面进一步解放的强烈要求。作为农村知识青年,他不甘受命运的支配,而是以社会转型为契机,运用知识和毅力走出了一条成功的奋斗之路。

少平的少年,生活十分贫寒,小说一开始让我们看到那个穿戴可怜,吃着三等“非洲”馍的学生就是孙少平。尽管他每天连一份只有五分钱的肉菜也订不起,但却有丰富的精神世界。到了高中毕业回乡当农民时,少平家中的光景还是像以前一样不景气,粮食不够吃,但他能凭借自己的知识和眼光去了解双水村以外更广阔的大世界。当改革的春风刮到这个偏僻的农村时,孙少平为失去当老师的机会而失落,但他为自己能外出闯世界而欣喜。实行生产责任制后,孙少平一家有了三个强壮的劳动力。随着时代的变化,孙少平的哥哥运用自己的智慧和能力,抓住机遇先“发”了起来,这样的客观环境为孙少平提供了发展的可能性。他希望走自己的路,靠自己的双手改变命运,开创自己的新生活。他一开始在黄原做揽工汉,却少有一般揽工汉的粗俗与猥亵,在艰苦的劳动之余,仍然坚持学习。他身处苦难,却能济弱扶危,鼎力救助遭工头欺负的打工女小翠。到铜城当矿工更是他意志品质、精神气质的充分体现。孙少平凭借自己强有力的双手,掌稳了生活之舵。

由于时代造就他们知识断层,又由于另一个时代对知识更新的要求,他更加努力学习。当上了采煤班长后,他又运用自己的知识,提出夏收保勤的“土办法”,从而解决了矿上常年未能解决的老问题。他对师傅遗孀母子俩的无偿照顾,是他热心助人品质的又一次升华,在自己手下工人兄弟面临死亡之时,他挺身而出,这是他的精神在新环境下的新发展。这一切都是因为有一个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制度。

### 三 保守型——孙玉厚

孙玉厚是保守型农民的代表,他的命运变迁带有很强的被动性。在责任制代替公社制之前,孙玉厚家的光景已经临近崩溃。劳动力虽好,苦没少吃,可是年年下来总是两手空空,不论农闲农忙,全家每天只能喝稀粥,真是穷到骨头里。孙玉厚老汉对这样的生活感到一筹莫展。他心里出现一堆堆难题:他在这地里拼命的劳动,家里的光景还是像筛子一样到处都是窟窿眼。“孙玉厚老汉在大女婿玉满银被‘劳教’,大儿子被批判时,都曾处于生不能生,死不能死的两难处境,然而,所有的危机时刻,支持他活下来的都是家庭,都

是作父亲的责任,对子女的义务。”<sup>[2]</sup>他之所以还活着,不是指望自己今生享什么福,完全是为了自己的几个子女。只要儿女们活得好一些,他受罪一辈子也心甘情愿。自从责任制以后,孙玉厚的光景已经完全变了。生活使这位老汉的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也发生了变化,甚至恢复了“年轻时的气魄”。

自从土地分开以后,孙玉厚虽说是五十好几的人了,但精神倒像年轻了许多。责任制开始,仅仅一年时间,一家人就不愁吃不饱了,对于农民来说,不愁吃饭,这简直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这毕竟是他们为之奋斗的主要目标啊!囤里有粮,心中不慌,孙玉厚眉头中间那颗疙瘩舒展开了。少安投资建成的双水村学校“落成典礼”时,他虽不抢着去公众面前露面,但他内心感慨万千,心情和当时批少安时的完全不一样。当然,最令孙老汉骄傲的是小女儿进入“大学校”——听别人说还是“重要学堂”,他做梦也没想到会有今天的荣耀。孙老汉在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富有正是因为社会制度变化带来的家庭变化而产生的。

### 四 “政治家”型——田福堂和孙玉亭

农村生产方式的改变对农民来说,有同等的社会条件,同等的发展空间。可是,作为乡土社会里传统宗法意识和特定期极左思想杂交而成的农民“政治家”田福堂和整个身心投入革命的孙玉亭的变化却与村民的变化不同了。田福堂和孙玉亭离不开大锅饭,离不开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田福堂是一位穿越农村各种运动的乡村政治家,建国后就一直稳坐在双水村大队书记的宝座上。多少年来,不管世事怎么变化,田福堂在双水村的领导权没有改变。在学习大寨政治高潮中,他幻想自己成为像陈永贵一样的全国有影响的人物。为了造就辉煌业绩,他修建水库,但被冲垮了,这成为他人生历程中的羞耻与嘲讽。这位久经考验的乡村政治家,怀有强烈的权力欲望,他发现孙少安是一个潜在的对手时,就想方设法压制他,不想让他在政治上出头。他密切关注少安的一言一行,一旦他的权益和地位受到威胁与挑战时,便会毫不手软地进行报复。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农村广泛推行生产责任制。这一生产制度的巨大变革对已适应了大集体的田福堂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意识到将面临一个同村民平起平坐的新时代,便本能地产生强烈的抵触情绪。当队长孙少安向他递交生产责任书时,“好像觉得是一颗即将爆炸的手榴弹”,毫不犹豫地判定搞责任制是明目张胆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坚决地把这一新生事物掐死在萌芽状态里。当生产制度的改革在周围地区如火如荼的展开时,历史的经验和“左倾”思潮所形成的思维定式使田福堂对形势做出了错误的估计,这是因为新社会制度即将改变他的人生命运,他自己不敢面对现实,而幻想“这是什么人的胡闹,过一段时间就会纠正”来安慰自己。他幻想手中的权力在自己管辖的小小区域里能抗击生产制度的变革。但是以孙少安为代表的村民却蔑视他的存在,搞起生产责任制,使田福堂第一次认识到自己的渺小,在理智上清醒地认识到这一切已是难以扭转的事实。在权力和地位变化之中,田福堂一直没有放弃对 (下转第81页)

他。

兔子抛弃妻子和鲁丝同居这并不是意味着他爱鲁丝。在性爱中他有一种控制和驾驭的成就感。性爱使他获得久违了的胜利感,带给他的是转瞬即逝但却灵光显现的超验感受。在鲁丝身上,兔子又发现了自我,又变得自由与完美。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作者笔下的这类女人她们生活的意义在于安抚男人,抚慰男人在现代物质社会压迫下的空虚和无聊是证明男性主人公存在的介质,在男性视角中,这些女性被迫成为男性的欲望对象和受害者。对这类女性的塑造反映了厄普代克对女性的歧视和男性至上思想。

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正在经历严重的精神危机,根深蒂固的旧生活方式正在动摇,享乐主义盛行,人们的行为既无目的,又无意义,找不到生存的意义,厄普代克的这部小说正是企图描述“一种美国人普遍感受到的困境”。主人公兔子和几名女性形象也正是这个时代的产物。他(她)们试图去寻找些什么,但在寻找的同时似乎陷入了一个又一个无法挣脱的网中。无论是母亲,妻子,情人,还是妹妹等等这些女性形象都远离了女性存在的真实本质,男性是此者,女性是他者,男性是超越,女性是内在恒定性。事实上,他们所描绘的女性形象并非女性的真实存在而是作者

的主观臆造。正如波伏娃所指出的,女性形象在男作家笔下只是一种“体现男性精神和审美理想的介质”,是一个“对象性的存在”,“一个空洞的能指”。<sup>[6]</sup>

#### 参考文献:

- [1] Richard Gilman "An Image of Precarious Life", in John Updike: A Collection of Critical Essays, eds [M]. David Thorburn and Howard Eiland: New Jersey: Prentice - Hall Inc, 1979: 15 - 16
- [2] 张京媛. 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2: 98
- [3] 朱 刚. 二十世纪西方文论 [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343
- [4] 常耀信. 美国文学史 [M].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 1990: 233
- [5] 陈晓兰. 女性主义批评与文学诠释 [M]. 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 1999
- [6] 张岩冰. 女权主义文论 [M]. 山东:山东教育出版社, 1998: 57.

(责任编辑:卫 华)

(上接第78页)

世事的关注,同时也反思自己走过的人生历程,感觉到社会制度的变革改变了他的一切,产生了一种被抛弃的失落感。当他一个人抱病在山沟里劳动时,看到善良纯朴的孙玉厚主动为他帮工时,不由地想起当年他们两人一同为地主打工干活的时候如兄弟般的感情,20多年来产生的距离与隔阂,在这个时候,完全消失,新的时代把他已经板结的心灵复苏起来。田福堂尽管对于权力仍有迷恋,但在时代大潮的冲击下,最终自觉地退出了历史的舞台,他最后也被社会同化,进城当起包工头,“走资本主义道路”。在孙少安投资修建的“双水小学竣工大会上,田福堂像一位平凡的农村老人,带着超然与善意的微笑,同双水村的新一届领导人历史性地坐在一起,这正说明了田福堂的人生命运在经过历史风暴的冲击之后从心理上 and 思想上接受了社会的变革。

孙玉亭是田福堂的政治家命运的补充与深化,他是一个“左倾”思想最忠实的信徒,是一位最坚定,最激进的农村“左倾”政治家。农村生产制度的改革,使他那激进的口头革命陷入了精神危机,“失去了亲爱的集体,就像没有娘的孩子”,他感到了孤独与迷惘,他向往那轰轰烈烈的大集体场面,他眷恋人们对他投来的敬畏的目光。在村民把全

部精力转向发财致富的时候,唯有孙玉亭还依然抱着高昂的“左倾”政治热情。在新的生产制度改革到来之时,他没有抓住时代给他的机遇,反而成为新制度发展的绊脚石。在时代的变革中,他最终得到的是精神上的失落、孤独、痛苦和物质上的贫穷。

在《平凡的世界》塑造的四类农民形象身上,我们看到了社会改革对农民命运的深刻影响,《平凡的世界》作为变革时代农民命运变迁的艺术写真,显示出现实主义文学的巨大魅力。

#### 参考文献:

- [1] 张 瑛. 论路遥作品中的三个男性青年形象 [J]. 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4(1): 99 - 104
- [2] 郑万鹏. 中国当代文学史 [M]. 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2000: 191.

(责任编辑:黄声波)